

论当代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建设

——兼谈民族文学文论的古今通变问题

黄怡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印度英语作家拉迦·拉奥在其长篇小说《蛇与绳》中借助印度的“史诗—往世书”文学叙述策略来改造印度英语小说的写作模式,并把自己对印度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和印度传统价值观的思考代入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之中。继而,批评家纳拉辛赫以拉奥的创作为蓝本,依托印度古典文论,建构起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批评理论。他们在印度英语文学本土化道路上的探索固然具有明显的学理缺陷,但他们对印度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印度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表明了弥合印度古今历史观对增强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属性具有决定性影响,以及印度英语文学继承印度文学传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为新世纪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民族文学中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及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族文学;印度性;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味—韵”理论;纳拉辛赫

中图分类号:I35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2)06-0242-1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1世纪以来,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确立和文化去殖运动的不断推进,以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和本土叙事为核心的本土话语建构,逐渐在许多新兴国家成为文学和文化建设工作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学界就本土化理论建设的目标和方法论等展开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若论研究者从具体的当代文学创作经验入手,经由文学批评获得系统的本土化理论升华,这项工作尚未取得大面积丰收。应该说,新兴民族国家的当代文学本土化理论话语建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也是广受关注的焦点。从文学创作的世界关注度和影响持久性来看,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创作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疑是一个亮点,它为印度英语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本文聚焦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进程,试图通过评述印度英语作家和理论家的本土化实践,为中国文学界树立“文化自信”提供镜鉴。

自20世纪西方文论被介绍进中国起,“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构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接续,而是对西方文论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理

作者简介:黄怡婷,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19ZDA289),项目负责人:曹顺庆。

论话语的“横向移植”^[2]。面对这样的理论话语危机,中国学界在1990年代提出应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失语症”现象。为此,学界主要从探讨“现代性”与“异质性”这一对概念入手,阐明西方文论在中国占据普适性理论地位的现状,以及中国文论进行本土化建设应当持守的话语立场。张荣翼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可概括为“现代性”“对话性”和“异质性”,其中“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出发点”,“对话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立足点”,而“异质性”则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提供“生长点”^[3]。张宏辉等进一步指出,要增进对“现代性”和“异质性”的理解,应当“把对‘异质性’静态特征的横向比较纳入对‘现代性’动态审视的纵向视野中,……既看到‘异质性’传统及格局的现代意义,也看到‘现代性’发生及演进中的异质基因与异质力量”,最终勾勒出“从本土观猎异域、从现世规划未来的一种现代图景”^[4]。

基于对中国当代文论这两大本质特征的认识,中国学界提出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两个探索方向。其一,曹顺庆等提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认为“我们需要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并能切实有效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才能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5];朱立元主张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实践中“以我为主,批判改造,融化吸收”^[6];张弓等在论述“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时,着重指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应该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其进一步发展也“应该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为参照系,洋为中用,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7]。其二,从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开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一直是中文论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根据陶水平的总结,中国学界主要提出了六种主张,即“融入和转化说”“融合说”“重建说”“传统资源的重新利用说”“复语说”“质疑说”^[8]。而到目前为止,相对于西方文论的强势,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尚不能令人满意,多位学者认为除了提出口号和论证价值,这项工作在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层面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曹顺庆等质疑“转换”论,指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使中国文论发展进程发生断裂,必将古代文论引上一条死路”,认为“立足于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促进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是一条很好的路径”,且“更新后的文论话语”应当“能够真正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当中”^[9]。他们对“转换”论的批评得到了贺仲明的应和,认为学界多年来对古代文论的发掘和整理“实质上并没有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的实践话语,更没有在现实文学评论中具体应用,也没有影响到西方文论在当前文学批评话语中的统治力”^[10]。可见,如何使古代文论经过“古今通变”,在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发挥系统性的作用,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切的问题。贺仲明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作家与理论家通力合作,共同来探索“现代文学的本土化道路”,尤其是理论家应当有意识地将作家的本土化创作探索“置于深远的民族文学背景上予以深化和拓展”^[10],这正是中国学界目前比较薄弱的研究环节。

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英语作家的领军人物拉迦·拉奥(Raja Rao)与印度英语文学批评事业的开创者纳拉辛赫(C. D. Narasimhaiah)合作,在创作与理论总结两方面,在新兴民族国家的当代文学本土化问题上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探索。他们以印度传统文论为基础,从英语在印度当代文学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发,由文学审美和文学功用两个维度切入,对现代小说进行适应性改造,试图在印度文学范畴内为印度英语文学构建其自身的本土特性,从而确立“印度”在“印度英语文学”中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案例出发,我们或可加深对当代文学的本土化以及古今文学理论的融会贯通等问题的理解。

本文从印度英语小说形式和精神内核两方面的本土化改造入手,分析印度英语作家和批评家对印度英语文学本土性理论建构的特点,并论证这一理论范式对当代印度英语文学批评事业

所具有的价值。本文的创新意义在于,探讨了当代文学理论本土化建设过程中文学创作者与理论建构者各自应当承担的职责,并对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问题进行评述,为中国学界提供借鉴。

二、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实践

印度马拉提语和英语双语作家、评论家穆克吉(Meenakshi Mukherjee)曾感叹:“没有人会为了我的马拉提语小说写一篇论印度性的博士论文,但在我们国家的英语文学中,印度性这一议题不但是学术写作和书评巡视中最受青睐的本质性难题,而且连作家们对此似乎也并非无动于衷。”^[11]穆克吉所谓“印度性”,指的就是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性问题。她的这一感叹揭示了印度英语文学本土化问题产生的两个背景:一是印度英语文学相对于印度本土语言文学而言,具有由英语的外部语言和文化特性带来的异质性,它需要解决如何融入印度文学传统的问题;二是同样相比于后者,印度英语文学对于印度这个新兴民族国家而言,具有由其全域性而产生的作为全印文化公约数的本土性,它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必须成为印度文学的代表。这两个背景问题决定了相对于印度各地方语言,英语作为唯一具有全国普及度又与殖民历史紧密相连的语言,如何落实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建设,使其不但能够继承,而且可以传扬印度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印度独立后新一代民族主义知识精英们绕不过去且具有紧迫性的一个基本问题。印度英语文学“三大家”之一拉奥是最早在创作中对这一问题作出系统思考的作家。他在早期代表作长篇小说《甘特普拉》(*Kanthapura*)的前言中就提出,印度英语文学创作应当帮助英语在印度成为精英文化的表达渠道。19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蛇与绳》(*The Serpent and the Rope*)则是拉奥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拉奥的小说创作又为印度英语文学批评家纳拉辛赫提出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理论构想提供了绝佳蓝本,共同促进了印度英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中展现以印度精英文化为主体的印度文学本土特性。

《蛇与绳》出版后,并没有立刻得到西方文学界的肯定。过了两年,这部作品才开始受到印度本土批评家关注。当时以纳拉辛赫为首的一批印度英语文学批评先行者对《蛇与绳》的不断发掘和持续批评,最终成就了这部作品以及拉奥本人在印度英语文学第一次繁荣时期的巅峰地位。人们公认拉奥“超越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作家——包括安纳德(Mulk Raj Anand)和纳拉扬(R. K. Narayan)——在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秩序、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确立了印度英语文学的地位”^{[12]xxix}。也就是说,拉奥的成名与印度批评家们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拉奥《蛇与绳》中的什么东西、什么特质契合了以纳拉辛赫为首的印度批评家们的心理期待呢?

纳拉辛赫是印度独立后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在当时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推进和前殖民地国家民族文学兴盛一时的大背景下,主张以印度传统文论为基础,结合现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成果,建立独立的印度英语文学批评体系,创立了富于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英语文学批评事业。在其纲领性文章《对今日印度文学的共同诗学系统阐述》中,他强调印度文学批评要围绕“印度性”(indianess)展开,具体来说,就是诗人(创作者)作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和体验者,在创作中要通过抒情(bhāvānukīrtana)使读者能够认识文学作品的效用(prayōjana)这一直接目的,以及人生目标(purushārtha)这一间接目的。批评的作用是帮助读者认识到这两个目的,文学批评者应熟知印度的文学传统和当下发展,了解重要的西方批评方法,发掘作品的味(rasagati)、韵(vy-angyacamatkṛiti)和合适(aucitya)^{[13]46-48}。“味”和“韵”是印度古典诗学的核心概念,纳拉辛赫认为批评家的最终责任就是发掘作品中始于这两者的“印度性”。这意味着在对印度英语文学的批评中,印度批评家们与西方批评界开始分道扬镳,转而追求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批评探索。从最终结果来看,《蛇与绳》无疑正是契合纳拉辛赫践行其批评理念的最佳范例。拉奥在《蛇与绳》

中尝试改造英语小说形式,使之能与印度文学传统相结合,其内在的本土性与纳拉辛赫对印度英语作家的期待不谋而合。

(一) 印度英语小说文体形式的本土化

《蛇与绳》问世后,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呈现两个极端。有相当一部分西方评论家质疑它是否可被视为一部成功的小说,但拉奥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反驳说,用西方的小说形式来看待一本“往世书形式”的印度小说是错误的^[14]。拉奥在谈及小说文体时,指出“印度人生活的节奏必须融入我们的英语表达中”,而往世书的“无边无尽”正体现了印度人是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的^{[12]xxx+xxxii}。

我们需要辨析西方现代小说与拉奥的“往世书形式”印度小说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按照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所说,“在大多数诗歌文类(狭义的诗歌)中,话语的内在对话性并没有被放入艺术运用中,它并没有进入作品的‘美学目标’,并且被人为地剔除在诗歌话语之外。然而在小说中,这种内在的对话性成了散文文体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并发展出一番独特的艺术阐述”^[15]。也就是说,当诗歌在正式的社会—思想这一更高的层面走向语言—思想的集中时,小说则通过各种市井俚俗的语言,即一些较低层次的文类,自觉地对抗文学语言(诗的语言),它因此是对话化了的。由此可见,巴赫金以诗歌的独白性作为参照,指出了对话性这一重要的现代小说形式特征,以及现代小说家常常会依靠语言的杂语现象或多语现象来建立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内在统一的创作个性。另一方面,拉奥强调的“往世书形式”的印度小说显然突出了他的创作对印度史诗文学传统的继承。往世书是“梵语文学中以往世书命名的一批神话传说作品的总称”^{[16]170},属于印度史诗文学。在叙事形式上往往和两大史诗一样,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推进文本的演述。从表面上看具有对话的形式,而这种对话从本质上来说却并不导向现代西方小说内在的对话性所带来的小说人物“众声喧哗”这一重要表达方式。以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薄伽梵往世书》(*Bhāgavata-Purāna*)为例,在前三章中,吟唱诗人苏多(*Sūta*)是推动演述发展的核心,其他人不论是学生纳罗多(*Nārada*),还是提问者沙乌纳迦(*Saunaka*),都只是通过提问来追随前者的思路。苏多作为古代印度吟游诗人的统称,显然又只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17]。虽然这些文本以对话体进行叙述,但书中人物对事物的呈现仍然主要采用单一视角叙事,他们的言语内部也不具有对话性和独立意识。往世书虽然运用了对话体叙事方式,但它遵循的叙事策略显然属于古典诗学理论体系,强调的是诗所需要的“语言—思想的集中”。因此,它也保持着和诗歌一样的创作意图,即抒情。关于诗歌的创作意图,不论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中提出的“净化”(*Catharsis*)论,还是最早的印度古典文论著作《舞论》(*Nāṭyaśāstram*)所提出的“味”(*Rasa*)论,其核心都指向诗歌对读者情感的作用,简单地说,诗歌的创作目的在于抒情。

概览《蛇与绳》可以看到,拉奥正是采用了这样的小说外壳与诗歌内核相结合的写作形式。其一,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罗摩斯瓦米(*Ramaswamy*,以下简称罗摩)的自述串起了整部小说,有一部分章节甚至以罗摩日记的形式写成,从而通过对过去之事的再思考把他人的声音更干净地摒除在外。这些无疑突出了小说的单视角叙事色彩和独白性。其二,正如印度著名评论家奈克指出的,这部小说“缺乏西方小说的所有中心要素——社会关系、心理动机、判断、对具体事物的热情”^{[18]104},不过它“成功地结合起印度和西方说故事形式中的因素”^{[18]104}，“最接近往世书,是历史、文学、哲学和宗教的独特混合,是人类所有存在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展示”^{[18]106}。在这里,他直接认可了拉奥所谓“往世书形式”的印度小说这一提法。综合以上分析,《蛇与绳》这部作品虽然以小说的形式写成,但它的叙事策略却有着浓厚的诗或更具体地说是印度史诗的特征,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诗的独白性,把主人公情感的抒发推到了读者关注的焦点上。

拉奥以抒情作为小说核心的写作策略与纳拉辛赫的批评构想一拍即合,难怪后者将这部作品奉为“我们时代的经典”,认为这部小说意在召唤印度文化的本质,体现了“印度的传统和它与西方相遇时的生命力”,而且它“体现的方式是非历史的,并严格限制于艺术范围内”^{[19]163}。

针对创作者如何创作这一问题,纳拉辛赫用印度古典诗学的概念进一步论述,他认为婆罗多的《舞论》已经有了明确回答。他说:“不同于西方观点中(文学是)对生活的模仿(Mimesis),印度的[观点]总结在了婆罗多提出的术语‘抒情’(bhāvānukirtana)(相对于‘模仿’[anukarana])中。……文学就是想象的经历以文字表现了出来……,而活跃于所有艺术和文学中的味这条原则是其灵魂(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13]46} 婆罗多(Bharata Muni)在《舞论》这部印度最早的文论著作中对“味论”下的定义是:“味产生于情由、情态和不定情。”^{[20]45} 这里后三个词都包含梵语词“bhava”^[21],本义为“存在,状态”^{[22]403},在戏剧学中衍生为“感受,感情”^{[22]403}。由此可知,印度古典文论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创作者的情感抒发和观众的情感接受。

以拉奥和纳拉辛赫为代表的印度作家和批评家们对印度传统文论中以“味—韵”理论为核心的创作观的认同,落实到《蛇与绳》的评论中,笔者认为纳拉辛赫对小说中一个情节的分析可引为例证。他指出,小说中有一处描述贝拿勒斯的一位贫苦的婆罗门父亲无力负担火葬仪式的费用,只能亲手将孩子的尸体投入恒河并看着他“像花儿一般打转”和沉没,这是小说中最令人痛苦又最感人的一幕,“像花儿一般打转”这个短语浓缩了“有关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哲学、玄思、史诗和传说”^{[19]170}。他以此论证拉奥在小说中并不沉迷于自己的情绪,而是注重通过对“人物的特性描写”来展现对印度文化的“认识”(recognition)而非“解释”(explanation)^{[19]168-169}。所谓“人物的特性描写”实际上等同于“味论”中的“情由”和“情态”分析;“认识”意味着作家是以生活的体验者而不仅仅是观察者从文化内部来阐述自己的感悟,那么他所写的就不是描述性的“解释”,而是自身情感的抒发,且是蕴含在具体场景描写中的暗示性的抒情——这实际上表示他对印度古典文论的借用已经突破了味论的范畴,进入专论暗示的韵论(dhvani)之中。9世纪的欢增(Ānandavardhana)在《韵光》(Dhvanyāloka)中说:“若诗中的词义或词音将自己的意义作为附属而暗示那种暗含义,智者称这一类诗为韵。”^{[20]238}“像花儿一般打转”这个短语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恒河上的茅屋”这个韵论中论述词的功能的常见例子^{[20]20}。诗人吟唱“恒河上的茅屋”是要暗示茅屋因为紧邻恒河而凉爽、圣洁。与此类似,小说中的这句“像花儿一般打转”不着一词,却能唤起读者去思考印度精神之圣洁、超脱等种种形而上的特点,是一个很好体现味韵(韵论中最常见、最主要的一类)的例子——而这也是纳拉辛赫期待读者能够从作品中发现的“效用”,即“使头脑敏锐,如擦拭蒙尘的镜子那样唤起或展现人们的心莲”^{[13]47}。

由此可见,拉奥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印度史诗—往世书文学传统中“非历史”的诗性叙述手法,成功地改造了从西方传入的现代小说写作范式,紧接着纳拉辛赫在印度古典文论中为拉奥的小说形式创新作了理论溯源,并进一步探索了印度英语小说体现印度古典文学审美价值观的可行性。他们都深谙印度文学创作传统的精髓,并坚定地贯彻到创作和批评事业中,促进印度英语文学在印度古典文论观照下构建起自身的本土特性。

(二)印度英语小说精神内核的本土化

文学的功用价值不仅在于追求审美的快感,还在于社会教化功能。正如中国自古以来强调“文以载道”,印度文论也从不忽视文学对人和行为的教化作用。纳拉辛赫的主张延续了印度文学这一传统。前文提到,除了认识文学作品的审美“效用”,纳拉辛赫认为帮助读者认识“人生目标”也是印度英语文学批评的重要目的。进一步,他由此借用印度宗教哲学的思想框架构建印度英语文学从属于印度文化核心追求的精神内核,这与拉奥在小说中重点探讨的“何为印度”

相呼应,表达了他们对印度英语文学价值和功能的定位。

发源于吠陀时期、由正法(dharma)、利益(artha)、爱欲(kāma)和解脱(mokṣa)四要素组成的“人生目标”,在漫长的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体的印度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渐确立起绝对中心地位,无论哲学、文学、宗教还是伦理学,都是其展现至高存在的方式。自印度古典诗学诞生起,这一点就不断得到强调。从7世纪诗学著作婆摩诃(Bhāmaha)的《诗庄严论》(*Kāvyaḥśaṅkārā*),到14世纪毗首那特(Visvanātha)的《文镜》(*Sahityadarpaṇa*),都在开篇指出,诗能使人获得“人生四要”。《诗庄严论》开篇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使人通晓正法、利益、爱欲、解脱。”^{[20]113}《文镜》篇首说:“即使是智慧浅薄的人,也能轻松愉快地从诗中获得人生四要的果实。”^{[20]811} 这比枯燥的经论更能引导受众领悟奥义。纳拉辛赫认同前人的批评观,他还通过归纳主要英语国家小说的主题,指出相对于英国小说强调的“社会道德”(social morality)和美国小说所关注的“超验的自我”(transcendental ego),印度小说的主题应当落在“人、世界和神”(Man, World and God)上面——这个“神”又可具体解释为“真相(the Truth)、绝对真理(the Absolute)和梵(the Brahman)”——如果否定了这个“标准”(criterion),那就是“切除了文学,而非对它做出判断”^{[19]165}。奥地利哲学家加布里奥(Leo Gabriel)在《印度哲学史》(*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序言中说:“不应有争议的是,内心的统一和世界的终极原理形成了印度人最早思索的主题。事实上这种思索是从与之联系最紧密的宗教中发源的,并在探索绝对真理中展开。……这种思索还从内部改革和发展了宗教的结构,这一过程……最终导向神和世界的统一,并始于……形而上的、理论的思想形式。”^[23]从哲学角度来说,印度人一直以来关注的是人和世界,并通过宗教的联系,以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将这一问题归结为人、神和世界的关系。对于占据印度绝大多数人口的印度教徒而言,思考这一组关系是为了更严谨地遵从教义度过人生四阶段,取得“人生目标”的圆满实现。由此可以认为,纳拉辛赫借助印度宗教哲学思想从文学功用价值上构建印度英语文学批评主旨,即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思考这一印度宗教哲学的终极问题,追求和体验自己的“人生目标”。

拉奥《蛇与绳》中有关“何为印度”的论述与上述思路脉络相通,拉奥以确凿无疑的口吻表示,印度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地理的,甚至处在历史之外,只由那些“孤立的存在(像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构成,印度在这些存在中被反复记起、体验和交流。[她]在历史之外,是传统,是真理”^{[24]352}。这段话中作为“孤立的存在”例证的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 Coomaraswamy),是活跃于20世纪早期的一位印度哲学家和玄学家,也是向西方介绍古代印度艺术的先行者。这表明拉奥心目中的印度是由历史上为印度文明建设和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体思想连缀而成的,是形而上的;而且,作为一名哲学家和玄学家,以库氏为代表的这些个体思想,显然主要植根于印度传统宗教哲思之中。向西方介绍印度古代艺术的开创性成就,意味着拉奥眼中作为“传统”和“真理”存在的印度又是可交流、可理解的。按照纳拉辛赫的话说,就是“整部小说都是对这种真理、对印度的传统和它特别是与西方相遇时的生命力的召唤”^{[19]163}。当读者阅读印度英语小说时,这些作品应当让读者感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的教化力量。

纳拉辛赫把拉奥笔下这种在文化交流中展现的印度哲学思想分成两种关系。

一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纳拉辛赫指出,拉奥所塑造的罗摩总能看到自己所游历过的城市的精神特质,如贝拿勒斯意味着非生非死的永恒,引人思考幻象与现实的边界问题^{[19]171},1948年印度人和英国人能在伦敦共庆女王加冕礼,展示了英国人精于妥协的品质和印度人善于升华污秽琐屑之事的能力^{[19]176},等等。但这并不是罗摩所看到的全部,他在每一段游历中几乎都表示“这就是我自己”^{[24]179,197,205}。纳拉辛赫将罗摩对世界的这种理解称为“一种文化偏爱”,且这种向自己求解的思维模式使得“他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任何人都不会是陌生人”^{[19]180}。这实际上意味着

纳拉辛赫认为,在思考人与世界(具体落实为各座城市)的关系时,世界最终展现为个人所想要理解的那个样子,即每一座城市都在个人眼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形象,但这些形象又统一于个人看待世界的特定模式之中。这样,他就可以用他所谓的形而上的“印度性”作为他与整个世界打交道的工具;换言之,这也是他所期待的世界与他或印度打交道的方式,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和而不同。如果能实现这个目的,那么就是他的批评确实帮助阅读印度文学的读者,在理解“印度性”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人生目标”的认识。

二是人与宗教的关系。小说中的核心人际关系是罗摩与玛德莱纳的婚姻关系。宗教对这桩婚姻的存亡起了决定性作用。从前文所引加布里奥的话中可知,在印度哲学体系中,宗教实际上是人认识世界和自己的工具,不同的宗教,虽然教义不同,但要处理的对象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宗教与世界的关系等同于前面所论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追求的也是和而不同。与此相同,人与宗教的关系就是人们分别选择一件性质相同但形态不同的工具来理解世界。那么,人与人在交往中应当秉持的原则就是包容对方的宗教信仰,通过不同的宗教工具交流人对世界的理解。小说中,拉奥赋予罗摩的婚姻观就是如此。罗摩说:“一个女人的神祇(god)必定也是她的男人的神祇。”^{[24]113}而纳拉辛赫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引用了小说中的另一句话来解释罗摩夫妇的感情破裂,他说:“玛德莱纳对佛教的认识‘更多的是智识上和心灵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19]181}这就是在强调宗教哲学对理解印度文化背景中人际关系的指导意义。

所以,无论是纳拉辛赫的批评还是拉奥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印度英语小说应当是人们以一种生动的艺术形式了解印度人基于宗教哲学的世界观的理想途径,并且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所谓“人生目标”的理解和认可。

三、构建当代印度英语文学本土性的新内涵

可惜的是,拉奥的写作虽然对印度英语文学批评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但1980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印度英语作家和批评家们却不约而同地将他视为一个不世出的天才高高供奉起来,不再亲近。纳拉辛赫的批评主张就此没落,近20年间几乎不闻其声,更后继乏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新一代印度英语作家和批评家们未能正确理解拉奥和纳拉辛赫的指导思想,把他们二人提倡的英语文学古典化或“梵语化”(sanskritization)^{[12]xx}单向度地理解为必须掌握梵语和古典诗学模式,乃至著名印裔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对拉奥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谁也没有学过梵文,那么我们是否不够印度?”^[25]尽管拉奥和纳拉辛赫皆言及印度古典诗学传统对建构印度英语文学本土特性的重要性,然而,倘若我们仔细体会,拉奥和纳拉辛赫指导思想的重心其实在于“印度英语文学何以是印度的”,这就涉及文学规则与话语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曹顺庆说:“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26]拉奥和纳拉辛赫最关心的议题,显然是印度英语文学如何才能进入到印度文学的独特表现形式、艺术审美追求和社会功用价值体系之中,也即印度英语文学应当如何适应印度本土“文学规则”的问题;但是,他们对梵语文学以及印度古典文论的直接化用,使得他们这套理论话语的表述范畴过于狭小,缺乏包容性,难以体现出对当代印度英语文学的普遍批评意义。他们对“文学规则”问题的思考,可以引导我们在深入认识印度文学和印度英语文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印度古代文学中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普遍影响,从而丰富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性内涵。

(一)融合印度古今史观,丰富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表现形式

印度文学在19世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新兴文类小说在印度各语种文学中的普遍流行为标志,印度文学的审美取向整体转向与欧洲文学接轨。对文学的这一转向起决定作用的是印度人的“历史”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文学与印度古代历史观的分离促进了印度现代小说的诞生;反过来,印度小说尤其是印度英语小说的本土化,其着眼点也应当落在重新建立印度文学创作与印度古代历史观的关系上。

印度史诗文学展现了在古代历史观支配下印度文学与历史共生的关系,即历史的真实以文学的想象展示,文学的审美追求则由印度人对历史的多面思考来呈现。印度文学的源头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既是最早的文学作品,又是印度人认定的最初的历史记录。它在内容构成上与世界上其他史诗的主要区别是,除了像大部分英雄史诗那样以神话化和传说化的方式讲述整部史诗的主干故事之外,它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呈现的是主角群体之外的其他英雄人物故事以及“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教诲”等“非文学成分”^{[16]69}。它也因此被认为“不是一部纯艺术诗歌”^{[16]69},而更像一部“百科全书”^{[16]53}。其实,从印度人对这部作品的文类定位——“历史传说”(itihāsa)^{[16]69}即可知道,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叙述成分,史诗中的所有内容都可汇集为古代印度人对历史的记忆和思考。首先,史诗通过大量的神话故事来叙写婆罗多族大战的双方与婆罗门教诸天神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实际上是以宗教神话的夸张和扭曲来解决远古历史的模糊性问题,并强化以天神崇拜为表征的祖先历史记忆。其次,史诗的主干故事讲述的是印度人的祖先婆罗多族兄弟之间的大战,这部分内容则是以文学性叙事的生动和逼真来解决历史叙述的可信性问题。再次,史诗中包含的大量“非文学成分”则可视作印度人试图以哲学性思辨的抽象和严谨来解决历史求真的本质性问题。这样,《摩诃婆罗多》就以神话想象的夸张、文学叙事的逼真和哲学思辨的求真,从多重维度勾勒出印度人眼中印度历史的真实面貌。

进而,印度人在史诗文学中形成的这种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手法,在后续的往世书和古典梵语文学乃至中世纪宗教文学作品中不断复现,转化成为印度古代文学的写作传统。比如,从写作题材上看,对宗教神话故事进行反复再创作成为印度古代文学进入历史书写的主要模式,于是神话故事情节中常见的“夸张”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不只是作为修辞方式而存在,更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文学描写手法,推动着印度古典文论所推崇的“味”论在作品中得到更鲜明的呈现,并最终促成“抒情”在印度古典文论中获得核心地位。再如,在叙写历史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各种哲学总结并使之沉淀在文学创作中,这就让以“人生四要”为中心表述的印度宗教哲学教诲成为印度文学功用论的至高追求。由上可知,文学的想象与夸张赋予了古代印度人阐释历史的丰富手段,而古代印度人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又成就了印度文学自成一格的审美价值。拉奥和纳拉辛赫能够分别提出自己对印度英语文学的创见,显然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印度文学传统中的这些规律。

与之相对,西方“现代”历史观给诞生之初的印度英语文学带来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印度人开始学习英国人,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的要求,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与文学、宗教、哲学等分开来。历史观念的更新使得印度英语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转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主要成为当下历史的展示窗口。二是西方历史观念给印度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对社会和历史的批判意识,作家的写作往往重在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意在以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作品推动社会的改良。传统文学对印度宗教、哲学、文化等的思考和表达在这些作品中被大大淡化了。1930年代在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和甘地主义思想推动下兴起的印度进步文学运动,就是这个文学创作思想转折的具体表现。许多以往不可能成为文学作品描写对象的印度底层人物一跃成为印度多个语种小说作品的主角,产生了多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佳作。从艺术特点看,这一时期的印度英

语文学乃至整个印度文学,都在日渐远离印度古代历史观视域下的传统文学创作思路,以模仿欧洲小说创作风格为要。因此,早期印度英语文学创作虽然对印度文学来说是向着现代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比起同时代的世界各地英语文学创作,它的印度文学特征并不鲜明。印度英语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回归印度文学传统,与之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否则既不可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可,也难以成为印度人民不可或缺的表达渠道,必将走向式微。纳拉辛赫对印度古典文学理论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一创作需求的呼应。

不过,印度当代英语写作也绝无可能回到印度接受现代历史观影响前的传统老路上,那么如何在保留印度英语文学时代先锋性的同时,又使之成为印度文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呢?将印度古代历史观在印度当代英语文学创作中以方法论的方式复现,或许是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1980年代,以拉什迪为首的一批印裔作家在世界文坛上掀起了印度英语小说的第二次创作浪潮。他的代表作《午夜之子》(*The Midnight's Children*)被认为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将印度神话、历史、宗教等元素糅合在一起,富于个性地展示了印巴分治前后印度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困境^[27]。西方批评界把他称作“印度的马尔克斯”,其实,他的写作显然是在深切理解了以印度史诗文学为代表的印度传统文学审美旨趣后才得以完成的。他对印度英语小说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复活了印度文学传统中文学与历史的共生关系,使印度古代历史观中包含的哲学、宗教、神话等思考维度再次成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大大拓展了印度英语小说的表现手法,使之将印度的古今历史观捏合在一起,加强印度英语小说的印度文学审美特征。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拉什迪对拉奥的创作理念持有异见,但他对印度英语小说的贡献与拉奥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试图在印度文学传统中为印度英语小说寻找恰当的表现手法,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工作在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这位被公认为21世纪印度最重要的英语作家笔下得到了延续,高希最为人所知的“鸦片战争三部曲”以丰富、细致的史料考据支撑起了历史小说的严谨,但对人物情感和心灵的刻画则体现出印度古代历史观的思维特征。比如,“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烟河》(*River of Smoke*),开篇就描述了印度劳工迪提把当年一同乘坐贩奴船来毛里求斯的诸位印度前辈和他们的事迹,都刻在新家园的一处海岛崖洞内,年年带领子孙祭拜和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在故事的不断变形中,这些前辈的形象逐渐神化^[28]。显然,这就是通过书写小说人物对历史的神话化处理,彰显印度历史观的独特性和严肃性,同时也成就印度英语小说的审美个性。类似这样的巧妙构思在高希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他的作品都给印度英语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新的资源。

(二)明确印度英语文学的历史责任,担当印度文学本土化建设的引领者

英语在印度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印度英语文学必须成为印度文学传统的优秀继承者,并在此基础上引领印度文学不断拓展其本土性意涵。

其一,英语进入印度的方式和它最初的使用场景,决定了它在印度语言体系中的精英属性。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印度的语言体系,总体上可分两类:一是作为宗教、宫廷用语的雅语(Sanskrit),在古典时期是梵语,中世纪往后则是波斯语;二是通行于民间主要由中低种姓人们使用的俗语(Prakrit),包含所有在印度各地使用的方言^{[16]214}。梵语最早是随着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成为高种姓的婆罗门祭司专用的宗教语言。对于印度本土达罗毗荼人来说,它是一种外来的异族语言。即使在流传最广的时候,低种姓底层人民也较少接触到它。与梵语的情况相似,英语是由英国殖民统治者带来的“异族语言”^{[12]xxx},早期主要用于行政管理领域,直至1960年代,其使用者还是以高种姓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为主。这两种语言都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够亲密,却在一开始就被用于思考为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教、政治等种种抽象、宏观的事物。拉奥注意到了

梵语和英语在印度历史处境中的这种相似性,他认为英语是“构成我们智识(intellectual make-up)的语言——就像以前的梵语或波斯语——但不是构成我们情感(emotional make-up)的语言”^{[12]xxi}。拉奥把英语和梵语相提并论,表明在他看来,这两种语言都是印度精英文化的展现途径。既然如此,让英语接受所谓“梵语化”^{[12]xx},也就是让印度英语文学吸收印度古代文学的精华部分,即梵语文学的创作传统,这是将印度英语文学有效融入印度文学的一种办法。

其二,印度英语文学在印度文学内部的精英性和在世界英语文学中的区域性,决定了印度英语文学必须像梵语古典文学那样,成为印度文学审美价值体系的最佳传承者和守护者。以雅语主要是梵语写就的古典文学作品,始终主导着印度古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纳拉辛赫和拉奥强调梵语文学与英语文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意在指出,从英语在印度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来看,印度的英语文学创作离不开对印度文学传统主干及其最精华部分的深刻认识。印度的历代批评家们毫不犹豫地将拉奥视为最好的印度英语作家,甚至认为“我们必须最终转向这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们,如普鲁斯特(Proust)和乔伊斯(Joyce),才能找到与这位作家[指拉奥]相当的地位”^{[12]ix},其原因就在于他成功地将印度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系拓展到了印度英语文学这个新的语言文类之中,从而既使之成为直接向世界展示印度文化面貌及文学发展成就的舞台,又让世人看到印度人在英语文学写作领域的创新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文学批评家们对拉奥的一致推崇并不夸张,他们在他身上寄予了对印度英语文学的民族主义厚望。

这进一步提示,印度的英语作家应当像古代梵语作家那样,不单是要自觉承担起传承印度传统文化的重任,还要树立以文化传承引导印度文学发展的主体意识,让印度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绽放出更大发展潜力,最终使印度英语文学对内像曾经的梵语古典文学那样,起到引领各地方语种文学发展的作用,对外则成为向世界直接展示印度文化的工具和媒介。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待传统文化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9]。这虽是针对中国的文化自信道路建设提出的要求,但实际上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确实,“文化自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族审美意识的建构以及审美民族性的彰显”^[30],而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建构这种“民族审美意识”及“审美民族性”的基石。具体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就是需要创作者和研究者皆深入探索本民族文学和文化发展历程中体现出的规律性特征,并以此为指导用心寻找古今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与所谓“现代文明”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持续发掘前者的本土性内涵,还可以丰富对“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本土阐释。

由此看来,以拉奥和纳拉辛赫为代表的印度英语作家和批评家们在印度英语文学本土化道路上的探索,固然具有明显的学理缺陷,但他们对印度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印度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坚持,帮助印度英语文学抵抗住了二战后世界“离散”写作浪潮和后殖民理论占据批评高地的冲击,表明弥合印度古今历史观对丰富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属性具有决定性影响,以及印度英语文学继承和发展印度文学传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为新世纪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他们最值得珍视和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2] 刘巍, 宋梓祎. 跨文化身份意识与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路径[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58-65.
- [3] 张荣翼. 现代性、对话性、异质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90-97.
- [4] 张宏辉, 郑春兰. 论文化现代性与作为跨文化事件的“异”——兼论文化三个“我”之间的隐秘关系[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10.

- 版),2022(5):184-195.
- [5] 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20-127.
- [6] 朱立元.以我为主,批判改造,融化吸收——关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思考[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2):117-126.
- [7] 张弓,张玉能.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西方文论[J].江海学刊,2016(3):196-203.
- [8] 陶水平.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近十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学术讨论的思考[J].东方丛刊,2007(1):124-140.
- [9] 曹顺庆,杨清.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反思[J].华夏文化论坛,2018(2):89-97.
- [10] 贺仲明.介入现实 化为现实——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两点思考[J].学术研究,2022(3):152-157.
- [11] MUKHERJEE M. The anxiety of Indianness:our novels in English[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93(48):2607-2611.
- [12] RAO R. Kanthapura[M]. Haryana;Penguin Books,2014.
- [13] NARASIMHAIAH C 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in India[M]. Mysore;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1986.
- [14] SANKARAN C. Myth connections;the use of Hindu Myths and Philosophies in R. K. Narayan and Raja Rao[M]. 2nd ed. Bern;Peter Lang,2007:107-108.
- [15]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M]. EMERSON C, HOLQUIST M, trans. HOLQUIST M, ed.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284.
- [16] 季羨林. 印度古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7] Srimad-Bhāgavatam[M]. Trans. PRABHUPADA B S, trans. PRABHUPADA B S, ed. New York;Bhaktivedanta Book Trust, 1972:1-245.
- [18] NAIK M K. Raja Rao[M].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Inc. ,1972.
- [19] NARASIMHAIAH C D. The swan and the eagle[M]. 2nd ed. Shimla;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87.
- [20] 梵语诗学论著汇编[G]. 黄宝生,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 [21] BHARATA . Nāṭyaśāstra[M]. 2nd ed. SHARMĀ B N,UPĀDHYĀYA B,eds. Varanasi;Chaukhamba Sanskrit Sansthan,1980:146.
- [22] The Student'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M]. 2nd ed. ĀPTE V S,ed.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70.
- [23] FRAUWALLNER E.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Vol. 1[M]. BEDEKAR V M,trans.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3:xiii-xiv.
- [24] RAO R. The serpent and the rope[M]. Delhi;Orient Paperbacks,1960.
- [25] RUSHDIE S. 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M]. London;Vintage Books,2010:2.
- [26] 曹顺庆.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23-130.
- [27] 萨曼·鲁西迪. 午夜之子[M]. 刘凯芳,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 [28] 阿米塔夫·高希. 烟河[M]. 郭国良,李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 [30] 张琼. 文化强国中的民族审美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分野与整合[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7-37.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ies of National Literature

HUANG Yit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In his novel *The Serpent and the Rope*, the Indian English writer Raja Rao learned from the Indian epic-puranic writing style and reformed the Indian English writ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an classic poetics and the Indian traditional values has been shown through the unique form and content of his English writing. Then, Indian critic C. D. Narasimhaih formulated an indigenized criticism on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writing of Rao and the literary theories of Indian classic literatur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obvious theoretical deficiencies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their exploration on the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literature and their insistence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Ind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ndicate that it is crucial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ancient Indi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the modern one on the purpose of indigenizing the contemporary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 is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for the contemporary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to inherit the Indian literary traditions. Their work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indigenization of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is century, and also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in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s well.

Key words: national literature; indianness;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discourse system; “rasa-dhvani” theory; C. D. Narasimhaih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